

深化改革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张 千 佟 盟 佟家栋

摘要: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历程始终与改革开放战略紧密联系。历经四十余年的探索,中国在制度和实践上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路径。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持续加深,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步入攻坚克难、全面推进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型市场经济,而开放型市场经济正在成为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内容。中国需要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型比较优势,从而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开放型市场经济; 新质生产力; 生产关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5.002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从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设定了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目标和时间期限,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的路径和开创新局面的要求。这对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①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一、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历程

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历程始终与改革开放战略紧密联系。历经四十余年的探索,中国在制度和实践上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路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并且提出“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②。随后,中国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以点带面开创了全新的开放模式。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协调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④。

改革和开放相互交织,推动了中国全方位开放体系的形成。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

项目基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数智要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贡献测算与实证检验”(2025M773714)。

作者简介: 张千,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071; zqtcz@126.com); 佟盟,英国切斯特大学讲师(切斯特 CH14BJ; mengtong0822@gmail.com); 佟家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tongjd@nankai.edu.cn)。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5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③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④ 卫兴华:《60年来政治经济学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发展评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求“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②,同时提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鼓励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加强监管,改革流通体制以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发展开放型经济,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③。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④。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⑤。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均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具体内容、工作重点、改革目标和实施路径,为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制定了一条既大胆探索又谨慎创新的改革路线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和深化发展的阶段。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需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转型与深化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⑥这一时期,中国也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从而更加深入地参与营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

中国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出发,逐渐推进制度型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⑦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探索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的的制度型开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改革领域^⑩。中国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2025年,国务院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26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需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25—27页。

总理李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①,并进一步强调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的辩证关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在国家主导制度型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效率优势。中国特色开放型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大胆而审慎的探索过程而实现的,这些经验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贡献了“中国范式”。

二、国际环境的挑战与开放型市场经济的攻坚阶段

(一)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

当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转型和不断深化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其占领全球市场、获取全球资源的重要途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中,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也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市场化和改革开放抱有“期待”的态度,并“欢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然而,中国依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逐渐完成对所有制造业领域的覆盖,并且在工业化进程中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头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上唯一具备对其构成全面威胁的国家,尤其是在技术、经济、金融、军事等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担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上升,更加惧怕中国可能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②,从而不惜使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逻辑和方式,试图遏制中国的全面崛起。这种手段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博弈,而是具有地缘政治内涵的大国斗争,体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本质差别。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战略性贸易战、选择性战略脱钩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希望建立反对中国的战略联盟。

中国在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既面临着上述挑战,同时也迎来一些新的机遇。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崛起,中国可以把握机遇深化拓展南南合作。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开展金砖合作机制等途径,加速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范围的延伸与布局,为全球经贸创造多元化合作空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也为中国带来更加高水平、深层次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共同期望进一步降低区域贸易壁垒,并为拓展开放市场提供制度保障,这为双方自贸区谈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与此同时,多边机制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深化改革也为中国推动包容性全球治理和加强区域合作机制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和倡导全球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规则制定,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在经济全球化受阻甚至遭遇逆流时,通过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为全世界经济共享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在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时,既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挠,又承载着全球新兴经济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望。当中国试图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实现自身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阻挠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甚至通过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①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5年3月13日,第1版。

② 2025年,美国《临时国家国防战略指导意见》将中国视为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唯一重大威胁;2021年,美国《战略竞争法案》将中国视为其技术霸权挑战者。

的方式阻碍中国。中国在选择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完善制度体系进行“最后一公里”冲刺时,面临着一个试图阻止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推动经济全球化、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面环境,甚至还面临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多重阻力。同时,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逐渐转变为全球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开放合作,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需要充分认识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对外开放的挑战与机遇,坚持开放这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西方资本逻辑。因此,中国必须坚持深化制度性改革,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建设。

(二)开放型市场经济建设的攻坚阶段

在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坚持深化制度性改革,坚定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在变局之下开新局。这也意味着,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党和人民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在国内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接轨和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也随之快速增长,实现了从贫困到全面小康的飞跃。然而,中国在向世界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这些挑战的关键在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中国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建立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以及如何保障市场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关键问题。在完善制度体系方面,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都能平等地获取关键生产要素,使其都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中国在建设和完善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应对这些挑战。在资源有效配置方面,借助数字要素、数据要素、资本、劳动、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依托先进数智技术发展服务业,成为中国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更好、更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又不失活力的营商环境,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也成为中国在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宏观经济等层面开展全方位、系统性高质量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过程中,还面临着如何更好地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变革,以及如何有效对接高标准区域协定的挑战。在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攻坚阶段,中国通过推动制度型开放,既能有效避免由自身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潜在差异可能造成的摩擦,又能促进深化改革从而实现对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因此,推动制度型开放成为中国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关键路径。中国在推进制度型开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一方面,需要在保证制度自主创新的同时,参与和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另一方面,要利用自主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立足于自身经济发展需求进一步扩大开放,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良性互动。

三、开放型市场经济与新质生产力

(一)开放型市场经济与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性重构

开放型市场经济不仅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充分条件,更是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动态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信息与通信技术、现代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术等不断革新,新的科技革命正在来临,这也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生产方式的产生。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时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①积极培育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增强发展新动能的关键路径。纵观历史,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会随着科技革命的更替而产生变化。前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对人类体力劳动的增强与替代上,使人类更具力量,使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得以提升,使人类物质财富和经济财富在生产精密化中不断增加。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借助信息与通信技术、现代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术等,实现对人类脑力劳动的延伸、强化和部分替代。而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可能创造出超越人类脑力劳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体”^①。同时,生产关系也必须适应正在发生变化的生产力,保证先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②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突破传统的制度框架,从而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开放型市场经济能够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实现关键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促使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放型市场经济可以促使数字要素、数据要素等数字经济新型生产要素,以及资本、技术、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自由、高效地流动。开放型市场经济能够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国际经贸合作,逐渐消除要素价格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开放型市场经济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体现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融合。在有效市场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关键生产要素向具有更高效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流动,实现资源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有效配置。在有为政府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政府能够助推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和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且通过容错机制提供坚实保障。与此同时,开放型市场经济所蕴含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体现在制度型开放促进要素配置流动和拓展要素配置空间上。制度型开放能够推动要素市场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通过衔接国内大市场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在要素流通、要素定价、要素确权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制度保障。在对接国际开放体系时,制度型开放能够进一步增强国内要素市场的韧性,并且提升在全球要素市场中的竞争力,促使关键生产要素向国内集聚。

(二)开放型市场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开放型市场经济,开放型市场经济正在成为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前提。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多种所有制企业地位平等,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来保证技术创新方面的激励机制。任一市场主体发明或创造了新技术,都有权利使用知识产权保护新技术,并以此获得利润。无论这种市场主体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都应当享受获取额外回报的激励。第二,开放型市场经济表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导者,有为政府需要发挥引导和协调的作用。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该减少干预,甚至在特定领域中不干预,重点扮演好市场经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配合,共同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和高效运行,进而减少市场经济机制的失灵或低效率。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的。市场的发展从根本要求突破国界限制。换言之,市场主体因经济利益驱动,会不断扩大产品的产量规模和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空间。这意味着,任何市场经济都将以全球作为其最终的目标市场。

当前,中国正立足于多个层面构建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一,在经济合作层面,中国切实遵守在双边、多边、区域等国际经济关系中签订的相关协定,并参照高水平国际规则

① 张千、佟家栋:《数字要素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自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11页。

开展经济活动。中国是国际规则的模范执行者,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增强自身话语权。第二,在国家层面,中国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开展经济活动,针对不符合这些规制的方面进行了系统性调整。换言之,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承诺了国内规制的统一与贯彻执行,这也是内外市场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关键通道。第三,在政府管理层面,中国遵循市场原则,尊重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市场主体或企业能够自主决策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问题。第四,在微观层面,中国将产品的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卫生标准以及科技成果的评判标准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良好制度规范。在这样一种规范制度体系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必将顺利且高效地运行。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赋能。要素创新性配置既是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要求,也是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前提。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依托数字要素、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破除关键要素流动壁垒,提高创新能力水平。另一方面,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与新型生产要素充分融合,能够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水平。

在当前形势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关键载体。一方面,中国通过出口结构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新兴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重点扩大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无人机等新兴产业在全球的市场规模,以新兴产业为载体实现中国经济的弯道超车。另一方面,依托先进数智技术和绿色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数智化和绿色化,通过提升企业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效率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以新产品和新服务逐渐形成对外开放的新型比较优势,实现传统产业的开放型转型升级。

四、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

(一)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国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效率性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路径。完善制度体系为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创造制度保障,而不断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则为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在制度体系完善方面,需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资源创新性配置方面,需要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造更加高效、更加创新的市场环境,进而激发全社会发展动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在建成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应当集中力量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利用统一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为中国企业健康发展和推动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这种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以法治化为基础、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国际化为目标。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活力的恢复,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赋能。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平等竞争,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公有制经济首先能发挥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然后通过适当的让利方式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而这正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遇到社会根本性矛盾时所不能做到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一方面是市场主体之一,在市场经济中正常运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还承担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重任。当新的科技革命到来之时,难免出现由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

成员利益失衡。政府可以合理运用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通过再分配机制补偿那些利益受损的主体,平抑社会经济的波动,进而使新质生产力继续进步和提升。相反,资本主义制度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在任何情况下私人资本的利益都不能被侵犯。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再分配只是有限的收入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超出资本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更不可能以全社会利益为中心动摇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从政府掌握的资源出发,启动经济社会结构变革下的再分配机制,保证和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动力,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变革,进而促进科技的创新和新型比较优势的形成,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建设

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国际市场、否定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反,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开放态度是坚定的,并且致力于在开放中寻求经济稳定运行与发展的路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而是越开越大。首先,在市场基础制度方面,要积极对标国际规则,进一步完善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制度,充分利用竞争中性原则,保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地位。其次,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依托先进数字技术打造智慧物流和信息传输平台,进一步提升商品与信息的流通效率。最后,在要素资源市场建设方面,要推动数字经济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充分融合,完善新型生产要素产权认定规则和定价体系,优化国内统一大市场中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中国要通过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给全世界作出示范,逐渐引导世界各国坚持走开放经济的道路,鼓励全世界在开放中求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稳定运行。主动开放更应成为我们应对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环境的策略。尤其当国际经济循环出现危机和面临冲击的情况下,中国更须优先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基于此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国内市场环境,保障国内各类市场主体顺畅运行,从而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换言之,在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时期,中国期待着经济全球化的稳定运行,期望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统一大市场。当前,中国立足于自身国情,利用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构建完善的国内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国内巨大市场作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通过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主动扩大开放,完善引进外资的负面清单,加快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

推进高水平开放型体制机制建设,需要将制度型开放作为关键路径。中国要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为主,有效衔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衔接方面,可以从CPTPP、DEPA等高标准协定出发,在数字贸易、环境标准等方面建立“先行先试”的压力测试区,并将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逐步进行复制和推广。在规制设计方面,要根据不同的领域和产业分类制定多层次、多维度、系统性的监管措施,避免对传统产业和新兴领域的“一刀切”。在管理开放方面,要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通过优化政务服务,不断提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既便于吸引外商投资,又能为国内各类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标准制定方面,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对接国际先进标准体系,还需要积极主导和参与数字经济先进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形成“中国标准”。

(三)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国新型比较优势

中国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同时,形成了对外贸易的新型比较优势。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格局。新技术突破了原有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通过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创造出新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一个国家是否积极把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决定了其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中是否具有领先优势,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也决定了其能否立于科技竞争、产业竞争、经济竞争的不败之地。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充分发挥自身“数字红利”,积极拓展外贸新增长点,寻找数字经济时代比较优势,成为中国扩大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

键。因此,中国应当依靠数字要素和数字投入逐渐形成新的产业优势,通过培育新的产品优势和服务优势,进一步形成新型比较优势。

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数字科技革命的叠加效应,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突破传统要素禀赋的静态约束,构建以创新主导、要素跃迁、产业先导为核心的新型比较优势体系。第一,通过创新主导实现科技与产业的自主可控,重构竞争优势的底层逻辑,实现生产力质的跃升。要在基础层面聚焦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关键技术突破,在应用层面推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产业中落地,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环境,将知识的溢出效应内生化的,推动产业竞争力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第二,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新型生产要素在要素跃迁和要素融合中的作用,推动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等关键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相互渗透、协调融合,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升级。第三,要积极争夺国际产业生态和技术标准的主导权,积极推动国内先进技术标准纳入国际体系,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主导规则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超前布局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等未来产业,通过技术非对称优势形成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而从“追赶者”的身份向“引领者”转变。

形成出口比较优势和实现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政策上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使制度政策与新兴产业行业特征产生协同效应,在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进一步形成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一方面,巩固和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聚焦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合理投入,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光伏、无人机等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逐步实现从潜在比较优势向显性比较优势的转变。

Deepening Reforms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Open Economic System at a Higher Level

Zhang Qian¹ Tong Meng² Tong Jiadong³

(1. APEC Study Center,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P.R.China;

2. Chester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Chester, Chester CH14BJ, England;

3.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P.R.China)

Abstract: After 47 years of gradual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open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stages of exploration and breakthrough, as well as transformation and deepening, all closely linked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trategy. The system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and deepen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China operates has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is environment includes anti-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trends, which tend to restrict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lobal economy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major transformation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continuously intensifying, pos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China. Today, China's open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entering a new era of tackling difficul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China has reaped the benefits and practical gain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its independently chosen open market economy, achieving a historic leap from poverty to prosperity. However, to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to strength, China still faces long-term challe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market economy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hase of breakthrough. Deepening economic reforms and expanding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re key to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Reform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ment, and openness provides a continuous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progress, with the country's door to openness expected to widen furth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fundamentally an open market economy. An open market economy is becoming a key component in adapt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 open market economy is not on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a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these forces. Establishing an open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crucial for adjust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adapt to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 open market economy can achieve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key production factors through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 open market economy helps promote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facilitat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path to establishing an open market economy system primarily involv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China need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nsidering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China must uphold and refine its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hile developing the public sector, it should also guide the growth of the non-public sector, fully leveraging the market's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will further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nterprises, which is crucial for restoring China's economic vitality. Second, improve the mechanisms and systems of a high-level open economy. By building an open market economy system, China aims to set a global example, guiding countries worldwide to embrace an open economy. This encourages global development through openness, contributing to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open economic system, institutional openness is a key strategy, complemented by autonomous and unilateral opening-up practices. Third, build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rough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hina should leverage digital elements and investments to develop new industrial strengths, cultivating new product and service advantages to form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y forming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achieving sustained growth in foreign trade, China can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to establish an open market economy system.

Keyword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Open market econom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责任编辑:丁培卫 孔令奇]